

潘灵《太平有象》
流动的村庄及其寓言性

□崔庆雷

潘灵的小说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温热的时代感，从《一个人和村庄》《偷声音的老人们》到《太平有象》，无不体现着他的这一写作意识与风格特点。《一个人和村庄》讲述现代性背景下人与村庄的新关系、新状态，《偷声音的老人们》关注移民搬迁后老年人的精神状况，这些都是伴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太平有象》同样关注现实问题，以一次伪象的来访展现一个村庄在几十年中几代人的迁徙史以及村庄与自然的关系史。

《太平有象》很容易被划入生态文学的疆域，一方面今年关于生态文学的讨论再次形成一个新的高度；另一方面，以人类为主体的“太平村”与象征自然的“象”之间恰好构成了几千年来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组生态关系，也是生态文学要着力思考和探讨的一个命题。但这篇作品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单一主题和层面上，而是以村庄作为观察支点，深入村庄的历史深处，并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之下，展现了一个边地村庄如何迈向现代、如何调整自身各个维度关系的过程。作品有一种宏大的内在结构和开阔的历史指向，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个以少数族裔为主体的边地村庄迈向现代的历史寓言。

在潘灵的小说创作中，村庄一直占有较为重要的叙事地位。无论是《一个人和村庄》中书写人与村庄的关系，还是《偷声音的老人们》中人与新环境的关系，村庄都作为一个隐性的主题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些作品虽然都是以人作为故事主体，写人在现代的命运与故事，但这些都内置于村庄的精神文化谱系中，他们的故事既内蕴着人与村庄关系的微妙变动，同时也以个体命运反映了村庄的现代变迁和新的历史位置。村庄的文化传统影响着人的命运，而人的变化又反向影响村庄的现实走向。这种关于村庄变化的书写作为主题一直或隐或显地矗立在潘灵的小说写作中。

作为从农耕社会文明中诞生的社会组织，村庄既有丰厚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积淀，同样有着现代社会体系中的结构性承担。在经历了20世纪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之后，城乡二元对立结构逐步消失，城与村之间的差异正在日渐消弭，但值得重视的是，村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经历自我分裂与重生，村庄文化体系的改造与重建，无疑牵涉着更具主体性的社会发展脉动。在这一跨越性的更新中，村庄经历了漫长的跋涉与迁徙，正如太平村在短短两三代人所经历的三次地点的迁移，正是这种变动的缩影。换言之，村庄在现代性语境下要寻找自己新的历史位置，建构自身的新文化与新样貌。在此过程中，村庄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体必然要处理多重关系，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自身文化传统的关系、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等等。这使得村庄始终处于一种变动和流动的状态之中，尤其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地村庄而言，由于历史性的发展滞后，这种流动性和自我调整的幅度就更大。在《太平有象》中，作者对于这些关系都有所触及和探讨。

在《太平有象》中，对村庄与其自身文化传统关系的探讨构成一个重要面向。潘灵小说中常常有一个毕摩形象。毕摩是彝族的祭司，主要职责是为族人主持祭祀、编造典籍、医治疾病，是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典型象征。毕摩的存在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在现代的延续以及传承。在《太平有象》中，这种文化传承有了时间的长度和历史的纵深，也有了更加生动的谱系形象。乌火家族世代做毕摩，从太爷爷起这个家族就肩负这一重任。到阿库、乌火、木呷等后人，这种身份稳定地延续下来。这既是一种血缘的延续也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承，他们接通着作为信仰的神，也一定程度影响着村庄的命运。乌火太爷爷则关于乌火的预言，长久地回荡在村庄上空，给村庄带来了阴影和不安，也给村庄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定程度上，如何面对毕摩家族就是如何面对一个村庄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饶有趣味的是，在《太平有象》中，作者展现了这个传统在现代性背景下发生的微妙变化及其过程，即从最初的深信不疑到后来开始松动甚至有自我解体的迹象。沙玛父亲佩伍的牢狱之灾即是这种深信不疑的体现和后果，但新一代的村民们更愿意追随现代政治体系中的实干家沙玛，相信人而不是神，而且在毕摩家族内部，这种传承也遇到了问题，作为新一代毕摩候选人的木呷就表现出了对于这一历史安排的反抗和主动的断裂，这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格局的即将诞生和形成。但在村庄权力结构核心位置的乌火和沙玛一代，仍然呈现出一种共存和共生的状态，他们是村里分管天地的大能人，是村庄精神力量的核心。三代人之间的三种不同状态，清晰地展现了村庄内部传统与系统关系的变动轨迹，也是一个村庄如何面对自身文化传统，如何脱壳而生成成为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历史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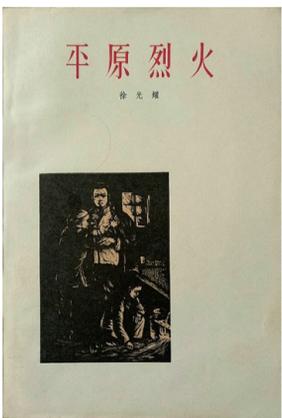
流动虽然构成了村庄的状态，但它的流向无疑是清晰的，它在不断地朝着现代的方向驶去。在此过程中，与现代的融合就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课题。面对现代，村庄无疑是弱小的，是改造的对象，但改造的主体由谁来承担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小说中，改造主体曾以内外两种身份出现。一次是马鸿鹤，他带着先进设备以现代主体身份进入山区和村落，利用现代机械和经营意识发掘了古老山脉上隐藏的财富，但他的进入动机并不是为了启蒙和改造村庄，而是一种纯粹的掠夺，改造主体同样可以从改造内部产生，从内部生发出自我变革、主动求变的力量。沙玛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主体，作为从村庄中成长起来的内部力量，他带领村庄实现了两次自我改造，完成了两次成功迁徙，建设了美丽富裕的家乡。他的改造无论从能量强度上还是动机上都完美地契合了历史发展的需要，是推动改造的乡村英雄。但对于一个相对弱小的边地村庄而言，乡村的现代性改造最终还是要以一种内外结合得更加强大的力量结构中来实现，野象来访恰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历史契机。太平村的第二次迁徙意味深长，虽然作品对于这次迁徙的描写不多，但显然外力的介入构成了主导性力量，太平村在这样一种内外结合的结构性力量中实现了跨越式的更新。这一细节描写有着极强的象征性，一个边地村庄如何现代的命运在此得到回应。

当然，一个村庄也必然要面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小说中有两次动物来访，一次是黑颈鹤，一次是野生象。两次到访发生在不同时期，有着迥然不同的结局。黑颈鹤来访发生在沙玛父亲佩伍时代，人与动物的关系尚处于一种模糊甚至是敌对状态，佩伍打算以黑颈鹤作为营养品给刚刚生育完的沙玛母亲滋补身体，黑颈鹤的交颈而死释放出一种强烈的悲壮感，也显示出那一时代人与自然的隔膜状态。面对野生象，村庄有了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呵护了野象宝宝的成长。从两次动物来访的对比中可以清晰看到，在村庄文化观念中，人与自然动物关系的变化，以及人们生态意识的显著增强。大象来访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们自然生态观念的变迁及其进步，而当野象来访后，这个村庄的整体迁移实际上是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主动性后撤，它走向现代的方式同时完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悄然调整，这也是当下新生态观念的真实写照和生态实践的一个典型路径。

太平有象，是一种新生态关系的显现，也是一个边地村庄现代命运的象征。

一部不可复制的抗战小说

□李红强



其实，相对章回体对传奇英雄形象的着力塑造，《平原烈火》的笔触主要在一支小部队生死起伏的成长过程。这是冀中抗日分区下辖规模不能再小的一个大队，突破日军封锁线后由100多人剩下仅仅37人。他们与大部队的联系，日军又以碉堡、公路、机动巡逻和遍地的“皇协军”、汉奸便衣、反水的地主控制了乡村；死亡的危机在百姓中弥漫，群众与之隔绝，这群农民战士几乎失去了最后的依托，沮丧、恐惧等低落的士气在全书开篇扑面而来……小部队将求生放在第一位，先是化整为零、化到三四人最小的单元，岂料竟被敌人零碎歼灭。低谷之际，他们主动求变，侦察敌情，集中出击，敲掉首恶，以小小的胜利一点点重振士气。在此过程，你发现民间的智慧在战斗中一点点激发出来，他们无师自通，除便衣、巧袭击，发动心战，分化伪军、孤立碉堡……战斗的烈火再次燃烧，冀中大地重新成为他们来去自由的海洋，最终配合八路军发起了反攻。

《平原烈火》紧紧围绕“战斗”而写，成了冀中平原领导下一群农民部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战争智慧自发生长、各式战斗方式如古老的器具一样琳琅满目的集合体，更是这群农民军在突围、失败、低谷、爬升、再挫折、再爬升、终于汇合为军民战斗洪流的过程。如果把战争本身视为一个生命体，《平原枪声》则是对这个生命体银钩铁画、具体而微的书写。

1950年代的评论者希望徐光耀将《平原烈火》写成三部曲，塑造出周铁汉历经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农业化的代表性形象。徐光耀终未成笔。也许反倒是幸运。确实，文学既需要史诗般的英雄形象，也需要为后人将战争中积累的情感、潜藏的技巧智慧以及战场的“原生态”一一敞开。《平原烈火》之所以不可复制，恰在这里。

铁流、赵方新《烈火芳菲》

一曲历史和人性的壮歌

□李恒昌

评论家丁帆曾说，“历史、人性和审美，是文学史的不二选择。”其实，不独文学史，对于绝大多数优秀文学作品来说，历史、人性和审美也是其必须具备的应有品质。仔细阅读由铁流和赵方新共同创作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烈火芳菲》便会发现，这部长达48万字的著作，也具有这种优秀品质，完全可以称之为一部关于胶东革命的历史、人性和审美壮歌。只是其所蕴含的历史、人性和审美品质，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而且放射着属于时代和人的生命光泽。

“历史”——《烈火芳菲》真实还原、形象再现了战争年代胶东半岛革命的恢宏历史，引导读者更好地窥见历史的真实，把脉历史的发展规律。

“这是一段隐秘的家国往事，也是一段不应该遗忘的家国记忆。”其中包括极为悲壮的“一一四”暴动、史上有名的天福山起义、至今被传颂的“马石山十勇士”，从胶东党组织的成立，到胶东抗日武装的建立，到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有胜利、有挫折，有经验、有教训，可谓气势恢宏，波澜壮阔。从中可以窥见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引导人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这是一种为胶东地区所特有的历史。作品书写的故事，是纯粹胶东大地的故事，是这片盛产海蛎子味方言、火药桶脾气、野性奔放大秧歌的土地上的故事，是胶东半岛奇伟儿女的故事，是大地海洋之子的故事。因此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尤其是作者将300多位乳娘为八路军、解放军抚养1000多个革命后代的故事挖掘出来，为她们塑立了不朽的文艺雕像，相信从此之后，“胶东十二姐妹”“胶东乳娘”，将会和“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一样广为传颂在共和国的大地上。这是具有某种神秘性质，并深具发展规律的历史。作者善于从历史的某些细节中，窥见历史的隐秘，洞见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作品曾写道：“这封把胶东共产党人直接引向1935年白银季的风雨腥风的指示信，就像一朵斑斓而吊诡的云朵飘过历史深邃的苍穹，又像历史幽深的小巷走过的神秘过客。”这意在揭示党组织来信的独特作用。“三个人都是水里来火里去的革命者，在风云诡谲的时代里，每个人都以带有自我个性气质的行动为时代做着注脚。”这里意在揭示个人在时代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邮递员左手一封信，右手一封信，假设他一不留神，投错了时间和地址，那将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情形呢？”这是对历史发展进行深度分析，彰显的是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之间的关系，规避了对历史再现的简单逻辑，使那段独特的历史显得更加神秘和深邃，也更具启示价值。

“人性”——《烈火芳菲》坚持了以人民性为根本的人性原则，彰显了革命者身上的人性光辉，折射出撼天地、征服人心的强大力量。

这是体现人民根本立场的人性，可以说，人民性是这部作品最显著的特征。革命者刘经三曾经自导自演绑架自己父亲的“好戏”。他为什么这样做？一切只为了革命，为了人民。胶东地区革命领导人琪琪，一定要将两个熟鸡蛋送给经受了刺激的烈属“疯子”三叔那里，看着他吃下

1949年11月27日，24岁的徐光耀在天津写出了新中国第一部抗战小说《平原烈火》。《人民文学》当时节选发表时，编辑们将其称为工农兵创作的第一座“纪念碑”，到了1951年3月，新中国第一家专业文学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便是这《平原烈火》。四个“第一”，标示出《平原烈火》在1949年这个“红色经典出版元年”的特殊意义。但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自上世纪80年代后的文学史在对“红色经典”的描述中，《平原烈火》很少被提及。甚至1959年10月推出的一套“建国十年来优秀作品”丛书中，《铜墙铁壁》《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1954年左右出版的著作都位列其中，还是不见《平原烈火》的踪影。文学史对《平原烈火》的这一“遗漏”，近来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也引起对新中国文学价值建构的反思。

探究1949年的文学史现场，《平原烈火》的“被遗漏”似乎有三个缘由更为突出。一是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的战争文学，主要以硝烟未尽的解放战争为主，抗日小说的数量不多。这与创作者对解放战争的充盈记忆和澎湃激情有关，更与新中国文学此时正在着力塑造的目标有关。毕竟，无论是涉及战争全局的《保卫延安》，还是局部战场上的《红日》，都更容易将党的领导、军民生死与共的战斗精神进行极致的书写，其主旋律更突出鲜明，也更能突出“为工农兵”的文学方向。《平原枪声》《荷花淀》以及《敌后武工队》等抗日作品则集中于敌后的游击战争，党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类抗战小说显然还不够支撑。第二，“改编”是文学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无论是《新儿女英雄传》还是《吕梁英雄传》等均采取了章回体的叙述形式，这一文学形式最能为广大公众接受，是表现英雄传奇、戏剧性冲突的恰当载体，也最容易快速塑造新中国的文学范式。年轻的徐光耀没有选择章回体的形式，而以现代叙述将生死体验倾泻出来，尤其是将八路军一支小部队从低谷到奋起的成长过程作为叙述对象，其戏剧性、传奇性堪比两部“英雄传”。第三，恐怕与文学评价的时代性有关。新

中国成立之初，太需要富有感召力的英雄形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理念也被奉为圭臬，《平原烈火》也有金刚似的英雄周铁汉，但战火中走出来的徐光耀为我们敞开的文本内容，实际上并不以人物为重。不可否认，在当代文学十七年乃至后来一段时间，抗战小说都比较少见。但必须承认，作品的背后其实是宽容、解放的观念。一旦抗战历史观放置到全民族的视野下被成功塑型，《历史的天空》《亮剑》《百团大战》《长沙保卫战》《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作品开始取得突破。即便如此，相对《大决战》《开国大典》等表现解放战争的剧目，反映中华民族浴血14年抗战的全景式扛鼎之作至今仍是缺憾，反倒是被缺乏基本史实的“抗日神剧”搅乱。在这“大制作缺乏”和“神剧丛生”的尴尬之中，70年前处于“红色经典元年”的《平原烈火》反倒显示出填补性的价值。简单来说，这是一部不可复制的抗战小说，以近乎“原生态”的样貌反映了八路军抗战的历史真实，其真实性非亲历者难以虚构，而对于基层民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胜恐惧中成就英雄的描绘，既朴素天然又引起后人真正的尊重。

《平原烈火》开篇以白描方式展示了一幅日军扫荡冀中抗日白描“地狱”般的全景。“一九四二年五月……冈村宁次坐上飞机，在天上指挥着五万鬼子兵进行大‘扫荡’，残酷的战斗，到处是一片红火。日本鬼子的汽车把遍地金黄的麦子轧烂在地上，骑兵包围了村庄，村庄烧起来，熊熊的火苗把黑烟卷上天去。步兵们端着刺刀，到处追着、赶着，把抗日群众从东村追到西村，又从西村追到东村。遍地是‘嘎嘎嘎咕咕咕’的枪响，遍地女人哭孩子叫……”这幅极具画面感的描写，岂是“神剧”编者所能想象。对于徐光耀这个刚刚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作家

在林那北中篇小说《仰头一看》（《收获》2021年第六期）里，灾难的来临充满了偶然。母亲临时改变计划，两个同学因为游戏而产生争执，扭打之间一块小铁片从手中飞出，路过的主人公一阵小心的好奇，一脚踩到坏的砖头身子一歪，这些阴差阳错的因素突然促成一个大不小的事故：飞出的小铁片扎入主人公的左眼。未来的岁月里，他的左眼视力逐渐丧失。

灾难并不会因为偶然形成而削减威力。对于主人公徐明来说，9岁那个平凡的秋天不幸成为他一生的重大拐点。整个少年时代，他不得不三天两头离开学校，懂懂奔波于各地医院寻求治疗，父母与姐姐的生活模式也为之改变。这个曾经迷恋过乒乓球的少年正式成为一个残疾人。生活半径一下缩小，各种令人向往的可能从此删除，许多瑰丽的图景也退出视野，他从此定格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高考已经遥不可及，他草率地在修理厂找到一份工作，又顺从地接受母亲为他安排的一个乡下女孩作为妻子。几十年过去，他的志向以及所有心气渐渐耗尽，时代飞速前行，他却停留原地。为了保护另一只眼睛残存的视力，甚至不看手机不看电视，空闲的时候仅仅坐在阳台上与浮云无言相对。这其实也是普通人对付生活，包括对付灾难的基本方式，一辈子都只能躲在生活的角落，无人问津。

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主人公54岁那一年。当年两个因为游戏而产生争执，导致铁片扎进9岁徐明眼里的同学分别以成功者的身份重现。一个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另一个则是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当年他们是肇事者，主人公失去一只眼，却从未提出索赔。这个事故显然是误伤；同时，主人公的父亲正在仕途的敏感期，担心索赔带来的法律纠纷可能形成不利的舆论影响。多少年过去，这一笔债务并没有真正消除。它在每一个人心目中以不同的分量不同的形式存在。残疾的主人公举全家之力购买了一套房子，而出售这套房子的恰恰是老朋友旗下的公司。这时，当年事故之中三个老同学的巨大身份落差与这一笔债务一起发酵。故事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情节越行越紧，各种矛盾波涛汹涌。

戏剧性的冲突带着这个时代熟悉的文化气息。市长与董事长的头衔足够让整条大街震荡起来。主人公的妻子开始骚动，她的广场舞团队与几个小官员配合得天衣无缝；主人公的母亲开始骚动，数十年的悲情、怨气和改善生活的渴望甚至让老迈的躯体挤出几分活力；主人公的姐姐开始骚动，购买一套打折的便宜房产几乎是所有人都会产生的意愿；主人公的儿子则开启了新颖而奇怪的另一幕，他借助无人机拍摄和网络直播等手段揭露房地产公司背后的黑幕交易，甚至愿意为了网络流量而拒绝了对方的好处。市长和董事长的慌乱隐在幕后。由于网络直播造成的严重威胁，他们不得不启动危机公关，试图平安着陆。令人奇怪的是，惟独主人公在走马灯一般的纷杂操作之中成为一个安静的旁观者。他当然是诸多矛盾汇聚的核心，然而他仿佛置身局外，事不关己。主人公表情漠然，内心迟钝，没有兴趣追随任何一条线索的起伏变化，不愿意配合任何一个步骤发言表态。他残存的一只眼睛更像是眼花缭乱的热闹背后的一只旁观冷眼。

事情也许很简单：主人公静如水，他从未考虑利用过往的事故填补现今的身份落差。既然无妄之灾无从回避，那就忍气吞声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既然只是误伤，过去或现在都谈不上索赔；每一个人的贵贱贫富皆安天命，动用异常手段谋求不义之财令人不齿；对方有问题应当坦言相告，刺探、偷窥、要挟等手段可鄙可憎。当然，诸如此类的观念仅仅零碎地盘踞于内心的某一个角落，甚至是某种无意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将这些观念整理为清晰的理论体系。他已经是生活的受害者，那就尽量不要避免更多的人受害。这是一种本分的善良，还是一种无能的懦弱？无奈与无助已经成为习惯，他认下了，日复一日躲进自己内心，以闭目塞听的方式给伤残的人生打造一副铠甲。他滑出了喧闹的生活，与身边所有人格格不入。然而，当生活变故突如其来试图改变这些的时候，这个普通人内心突然显出意外的坚硬。他执拗地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日常守则，内心无法贮存来自妻子、母亲、姐姐、儿子和老同学制造的巨大噪音，他更不愿伤害过他的两位老同学也被自己儿子所伤。

当然，主人公强硬和坚决的形式也不过是软弱的，他以沉默和不配合抵抗周围所有人，最为激烈的想法无非是想从阳台纵身跳下去。许多生活层面之所以没有垮塌，恰恰由于那些朴素敦厚的日常守则无声而坚实地存在。可以看出，这种人性的日常守则正在遭受多方面的侵蚀，各种手段和心机似乎正获得丰厚的回报。不免担心普通人的基本内涵会不会成为罕见的品质，甚至作为愚蠢的表征而遭受抛弃？当小说结尾主人公徐明以从未有过的勇气决定为儿子的偷拍向两位曾伤害过他的老同学道歉，同时劝他们别对百姓做亏心事，这个一向不起眼的男人，终于像巨人般站起来，虽身单微，但仍然是那个没有被灾难所打垮的好汉。

林那北《仰头一看》

偶然的灾难与日常守则

□陈思